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坚持完善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第九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
暨第十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综述

张广辉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联合主办，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承办，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政治经济学研究》编辑部、《当代经济研究》编辑部、学习与探索杂志社、经济纵横杂志社和《海派经济学》编辑部等机构协办的“第九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暨第十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于2020年11月8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辽宁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大学、辽宁大学等全国百余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就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深入研讨。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谢地教授主持开幕式，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辽宁大学副校长杨松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辛向阳研究员分别代表承办方和主办方致辞。论坛的召开对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对开拓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视阈与研究方法，具有积极意义。

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就和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我国发展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是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在主旨报告中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着不同的表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或者经济制度及其运行和发展。在研究过程中应从统筹科学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制度与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与生产方式以及经济制度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

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李建平教授认为，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我们对恩格斯的最好纪念，就是全面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的地位和贡献。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更新速度的不断加快，我们更要从恩格斯身上汲取学习的智慧和力量，依靠学习和实践走向未来，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张新宁研究员指出，列宁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

“市场经济”范畴的伟大革命导师，他把社会分工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论证了市场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列宁认为，市场经济同一定所有制关系的结合会随着生产力水平及其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呈现不同的层次，并在历史进程中呈现一定的阶段性，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宋朝龙研究员认为，金融资本扩张是西方经济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金融资本积累包含着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两方面，当生产性积累遇到危机时，金融资本试图通过加强非生产性积累来解决危机，结果却使危机越来越严重，这就是金融资本自身的悖论逻辑。而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新的制度动力，在抵御西方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中表现出巨大的优越性。

浙江大学卢江副教授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系统性危机的生成路径包括从经济基础危机引发上层建筑危机的灰犀牛式路径和由偶然事件开启并导致国家整体事务塌陷的黑天鹅式路径。在单点或多点触发情况下，系统性危机存在平行演化、发散演化和趋同演化三种动态路径。依据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和分配等理论发现，资本霸权是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主导逻辑。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的新社会因素不断生成，改良主义政策虽然延缓了系统性危机，但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被取代的历史规律。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发生，由此导致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面临重构契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

谢地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应充分发挥我国的人口优势和市场优势，在国民经济范围内建立起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良性循环。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更高水平的外循环，真正做到利用好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教授认为，在全面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背景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国内大循环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收入分配和流通交换中间的桥梁连接机制，把生产和消费有机结合起来；在国际大循环中应发挥我国在生产端和需求端的潜能和优势，从低成本要素优势转变为规模化优势和创新优势。

清华大学李帮喜副教授指出，经济循环过程本质上是价值循环，价值在货币、生产要素和商品形态之间不断转换是经济运动背后的核心逻辑，只有价值能够实现顺利循环，经济才能够有效运转。实现价值循环的条件是技术结构、分配结构、需求结构、生产结构之间的相互配合。

南开大学乔晓楠副教授认为，我国在计划经济与改革开放时期分别以内循环与外循环为主体实现了工业化的两次跃升，完成了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的历史性蜕变。未来，为应对成本悖论以及全球失衡带来的挑战，实现工业“由大到强”，推动工业化的第三次跃升，有必要调整国际收支，重构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

福建行政学院谭苑苑副教授认为，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以及实践认识论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三大科学方法论，它们既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指路明灯，又是我们解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丰富内涵的三把钥匙，确立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唯物史观的方法论遵循，我们要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多维度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必须坚持实践认识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 脱贫攻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最为艰巨和复杂的任务之一，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

大连理工大学李桂荣教授认为，40多年小康社会建设的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制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保障，人民至上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价值追求，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就是真正落实共同富裕的理念。

西南财经大学韩文龙副教授认为，共享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石，新时代农民市民化过程中保障和实现其农地财产权益是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实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需要构建以用益物权为主要权属内涵的农地财产权体系，创新以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宅基地资格权和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为主的农地财产权经济价值的实现路径。

河南农业大学赵意焕副教授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有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学意蕴，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价值追求。党的十九大把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资本论》共同体理论认为，集体更能够创造和发展生产力、集体更利于形成乡风文明的社会氛围和农村劳动者的全面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应该将国家力量和农村集体力量有机结合起来。

4. 数字经济与数字劳动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数字经济和数字劳动将会被广泛关注，马克思主义是理解数字经济和数字劳动的思想武器。那么，数字劳动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

华中师范大学孟飞副教授认为，数字资本逻辑驱动下的数字劳动在本质上仍属于生产性劳动。建构在“一般数据”基础之上的数字资本从未改变通过攫取剩余价值来实现资本增殖和积累的本性，尽管它能暂缓资本生产过剩危机，但依旧无法扭转资本主义生产比例失衡的趋势，也就无法规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云南大学王守义副教授认为，基于马克思生产性劳动理论，数字劳动本质上是生产性的，它加速了资本积累，有利于缓解经济危机，但未能真正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遵循“技术创新—经济周期—劳动形式变化—资本积累过程”的逻辑顺序来解读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我们摆脱经验主义的陷阱，又能深刻理解数字经济背后的生产关系变迁，进而从资本积累和价值创造过程透视数字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

山东财经大学崔宝敏副教授认为，无人工厂时代工业生产制造主要以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过程虽然需要较少的人甚至不需要人，然而生产出的财富和价值并没有减少，这似乎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挑战，由此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人工厂生产模式下价值低估命题，以此来解释无人工厂的价值源泉之谜，并分析了价值低估的四种机制以及价值低估的原因。

电子科技大学李弦讲师认为，数字劳动是数字劳动者在雇佣或者非雇佣关系中，通过数字平台所进行的各种有酬或者无酬的“生产性”劳动，可以从时代背景、劳动主体、雇佣关系、是否有报酬等角度来划分数字劳动的不同样态，这些不同样态的数字劳动具有数字劳动过程的结构化变化、产销一体性、生产与休闲娱乐之间边界的消弭等新的结构性特征。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编辑：黄华德）